

# 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变研究

胡世前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5)

**摘要:**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公民意识的增强不仅导致国家全能主义的松动,而且也强烈地冲击了传统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新形势下,通过体制改革与创新培养国家与社会的协作共生关系是解决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既是构建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前提,又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但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只能注重发展特色。中国公民社会的科学合理的发展是实现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良性转换与维护社会和谐目标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国家;社会;协作共生;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12)04-0086-07

**收稿日期:**2012-06-03

**作者简介:**胡世前(1979—),男,辽宁丹东人,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大力推进经济与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一直致力于解决或缓解因“民生”和阶层间利益冲突等原因产生的复杂且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通过全面彻底地实施“富民工程”来大幅缩小城乡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是解决国内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基本上认同政府可通过提高社会再分配能力和加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障等方式来解决现存的我国复杂社会问题的学术观点。但从近年来国内群众性集体事件仍然持续上升和性质复杂化的现象来看,我们认为,现阶段产生我国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不仅与社会的公平性有关,更与我国的特殊体制和历史遗留问题等有着直接关联。所以我认为,处于重要转型期的中国应在大力推进“富民”与“改善民生”工程的同时,积极地通过改革性政策的导入与激励型手段并进而实施的方式全面有效地培养国家与社会两者间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关系以后,进一步向实现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理想目标努力迈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地解决我国正面临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从本质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

场”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隶属并受控于国家的局面,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式”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并将两者的关系引向相互依赖与共生的层面上来。这与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始终与国家保持对立关系恰恰相反,这正是“中国式”公民社会的特色。本文在重点诠释转型期国家与社会是如何从初期的相对紧张关系中解脱出来并构建起目前的相对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展望从两者这种协作共生关系向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会给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何种正面及深远的影响。

## 一、中国式“治理”

### (一)“治理”的由来

发源于西方福祉国家和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中心主义”思想曾风靡全球。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和福祉国家面临重重危机等原因加快了西方国家对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同样,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了探求新型社会管理机制的浪潮中。“国家中心主义”的没落致使政府丧失了对政策决策和执行的绝对性主导

权,与此同时国内又出现了市场失效的局面。因此,政府在面临双重危机的情况下对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产生了强烈需求。而“治理”的出现正好满足了政府的这种需求,所以“治理”应起到协助政府管理和弥补市场调节功能不足的作用。<sup>[1]</sup>

“治理”的出现给政府的社会管理方式带来了巨大的转变。首先,从层级官僚组织结构走向了扁平式的网络式组织结构。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垂直·层级式的,但“治理”追求的却是水平方向的协作·网络式的联盟关系。其次,“治理”促进了分权。因为“治理”提倡非官僚化,它的理想目标就是实现分权。虽然“治理”积极地促进了政府从集权行政到分权行政的改革,但它提倡的分权不仅仅只局限于政府权力的分散。“治理”更试图打破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行为主体的这一局面,在力求实现行为主体多样化的同时也高度认同行为主体的分散性、自由性与独立性。所以“治理”虽是围绕政府进行的,但其更关注的是政府通过何种渠道或方式与社会进行交流和互动,最终在两者之间构建出良好互助和协作关系的方法与过程。最后“治理”促进了政府从垄断向寻求市场参与和社会合作方式的转变,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式管理。总的来说,“治理”促使政府通过分权和体制改革来实现市场、社会、政府三方共同承担生产与服务功能的目标,而顾客(公众)在此过程中将享受来自多方提供的更优质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著名学者库伊曼(J. Kooiman)认为,“治理”所要塑造的社会结构和追求的理想化社会秩序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制性,并且“治理”需要多个行为者或利益集团在拥有或培养共同目标的前提下相互影响并协作完成。<sup>[2]</sup>全球治理委员会则认为,“治理”的本质就是通过协调手段将原本持有不同立场的利益集团或个人凝聚在一起,并对某些共同的公共目标进行持续性的相互协作的全过程。“治理”虽不是一种正式制度,但应具有过程、协调、持续性互动及覆盖公私部门的四大特性。<sup>[3]</sup>

## (二)中国式“治理”的出现

在我国特殊的体制下,学界对提倡社会自由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的研讨起步相对较晚,但对 governance 却有“治理”、“共治”、“善治”、“网治”等很多种译法。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从 90 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也加入了推动“治理”(governance)代替传统式的“政府”或“统治”(government)的改革热

潮中。“治理”本身具有可将政府与社会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合理性再分工,并促成国家与社会间形成互动与协作关系的功能。所以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导入“治理”的主要原因不仅只是为了顺应“世界化的行政改革”的潮流,而是从全面高效的满足来自于社会内部多元化需求的角度出发的。最近中国政府进行的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和市场及社会间的关系,培养国家与社会间的平等及合作关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改革都是紧扣着“治理”而来的。

中国学者孙柏瑛和俞可平在结合中国国情与特殊体制的基础上拟定了中国的“治理”发展方向。两位学者认为,“治理”应具有广泛性、参与性及互动性。即“治理”虽源于政府但不能只局限于政府,在提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互补性协作的同时应重视社会成员即全体公民间的互助、信任及依赖关系的培养。<sup>[1][4]</sup>“网治”是 governance 的另一种译法,它不仅更直观地表明了其提倡民主、公平与协作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更形象地描述了其力图通过构建一个扁平变化的网络结构,并将每个公民联系到一起形成协作关系的最终目标。

## 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变革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按照地域和产业结构特点将国家分为两大领域,并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分别实施了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化管理政策既有助于政府对国家的统筹管理,又可将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与人口的无序化流动限制在可管控范围之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实行的特色化社会管理方式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事实。

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在衍生了“市场”这一新概念的同时也引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变革:1. 公民形成了实效性价值观。1978 年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科学化管理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国家经济发展理念。该理念的提出把以往崇尚平等的公民价值观集中地引向了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上;2. 流动人口的出现。私有经济领域的确立促使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集中向城市和工业领域的移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原本相对封闭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活力;3. 社会分层多样化。经济发

展与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社会阶层的细分化。从改革开放前仅有的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三个范畴扩展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约十个社会阶层;<sup>4</sup> 经济领域中形成多方合作机制。在市场体制的深化过程中,“顾客”对“多元化产品”产生了强烈需求。政府在完善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对各方面的供需关系进行了全面性的调整与改进,有效地促进了官民合作机制的形成。这也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二)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

西方学者从理论出发,认为虽然国家、市场和社会都有各自独立的活动领域,但是三者之间一定会存在交叉重叠部分。西方的公民社会主要由 NGO、NPO、CSO 等组织构成,其中 NGO 最具代表性。国际社会通常会按照具体活动领域将其划分为如人权、环境、女权等非政府组织。中国考虑自身的国情,并未完全按照西方的经验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而是根据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是否存在隶属关系将其划分为半官半民和独立性非政府组织,另外,按照组织的创建性质将其区分为官方主导与民间主导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统筹管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与市场机制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逐渐地出现了如全部由农民组成的经济联合体、跨地区的工商企业的合作与兼并机制、城农间的产销合作社等完全民间性质经济合作组织。而经济领域内非公共部门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其他领域如全国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工商联合会、各种专家学者协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学术联合会等非政府组织(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性质的社会团体的蓬勃发展。这些多元化社会团体的出现既从本质上改变了以往国家与社会几乎完全处于胶合状态,又实效性地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朝着正和博弈的方向发展。我们提倡的两者间的正和博弈关系是指国家的力量在不断地增强的同时,公民社会在国家的扶持和许可范围内不断地发展壮大,并最终与政府一同构筑一个适度平衡、自主和健全的社会。

## 三、国家与社会间“和谐”关系的培养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将社会结构进行了重组,同时也使社会问题的成因和表现形式变得复杂化。特别是近年来中国

公民通过参加群众性集体上访或在互联网上发表个人言论等激进的方式表达个人对社会乃至政府不满情绪的事件时有发生。该类问题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了我国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为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社会安全隐患,政府应该继续依托牢固的群众基础,围绕着公民是否支持或接受政府正在执行的或即将推出的社会管理制度这一主线深刻地探索和广泛地调研与实践。

### (一)国家与私企主间的关系转变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主体多元、文化与民族多样及公民价值观多型的网络结构时代。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在制定及完善各项方针的过程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视团结社会力量。所以国家与社会的各个构成元间的关系转变也是在围绕着团结与协作这一主线进行的。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私企主的数量与私企的经济规模逐渐地占据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同时私企主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西方学者 Moore 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家的存在就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所以与资本家拥有类似身份的私企主将会在经济欠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起到绝对性的推动作用。<sup>[5]</sup>从权威主义视角出发并结合特殊国情与脆弱的国民性等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如果直接将先进化的社会、政治乃至经济等制度或体制转嫁到中国来,结果将很容易导致社会秩序全面失衡。所以在转型时期,为达到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与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社会必然会对一种过渡性权威产生强烈的需求。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需要的就是一种典型性但又具有特色的新权威主义。所以中国的私企主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立场应是倾向于巩固这种新权威主义体制。

中国政府推出的“广纳群贤”政策得到了私企主的积极响应。该政策不仅囊括了保障私企主的合法经营活动和收入等相关内容,更赋予私企主以更多的政治身份及社会荣誉。2001 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的重要时机,国家与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曾明确地提出应积极将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私企主吸纳到党内来的政治观点。这向世人传递了中国优秀的私企主在社会与政治地位被显著提高的过程中已经与国家逐渐地培养了相互协作与共存关系的信息。而在西方国家里恰恰相反,资本家与国家基本上保持着对立关系,所以中国私企主经历了怎样的

过程才最终与国家间构建了和谐关系的呢?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政府对私有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政府不仅推出了鼓励私有经济部门发展的倾斜性政策,而且从法律上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在1997年第十五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2000年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认同了私有经济部门与国有经济部门享受同等待遇的方针政策。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推出了《物权法》,国家通过颁布宪法的方式在法律上进一步加强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表明了国家高度认同私有经济部门的存在与发展。第二,精英决策层在私有经济与政治领域内的互动与交流。精英决策层主要通过国家实施的“政企分开”改革成功地进入了私有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主要通过体制改革、所有制转换和股份合作制等方式掀起了国企改革热潮,并成功地将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在此过程中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干部成为了私营企业主。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1989年—2001年期间我国暂停了大规模私企主入党的管理和审查工作,但在2001年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公开地作出了要恢复私企主的入党管理工作的指示,同时强调并认同了私企主对现代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sup>[6]</sup>根据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形势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仅包括工人和农民等无产阶级,而且也包括作为城市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精英群体即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sup>[7]</sup>笔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适时地为优秀私企主进入政治舞台再次打开了绿色通道。大批的优秀私企主不仅成功地进入了各级人大与政协机关、行业协会等各种组织,而且在民营企业集中的乡镇地区,优秀的私企主频频地在具有民主自治性质的村民选举中获胜并当选为“村官”。所以,优秀私企主在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的过程中与国家缔结了长期而稳固的协作共生关系。

## (二)国家与社团间的关系转变

群众性社会团体组织(以下简称:社团组织)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不仅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而且有效地改善了传统管理方式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僵硬关系。而国家对社团组织实施的管理政策将会对其生存状态与发展方向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近期国内的社团组织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增

加,而且在规模与影响力等方面也有了显著提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全国总工会、妇联、工商联等非政府组织。中国社团组织的质与量的同步发展很直观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得到了系统的加强与完善的事实。中国政府对社团组织进行管理的宗旨并非是鼓励其自由发展,而是坚持“抓放”相结合的原则。政府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这一特色政策的呢?首先,政府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地认识到社团组织的存在十分有助于政府高效安全地解决公共与非公共领域的各种复杂性问题。其次,发展社团组织不仅可以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促进社会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方法,更是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一种体现。最后,推动社团组织的发展既是政府始终贯彻执行扩大国内统一战线指导方针的延伸,又是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虽然社团组织的存在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对政府十分有利,但在特殊的政治体制与国情下,政府只能通过开放部分领域,合理并有条件地发展社团组织。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是通过规范社团组织管理办法和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植与资金资助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对社团组织的“抓放”管理。“抓”是指政府通过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规范社团组织的发展。该《管理条例》的内容基本上覆盖了社团组织从成立之初到公开性业务开展的全过程。虽然该《管理条例》的颁布促使社团组织进入了正规化与国际化的发展,但也给其带来些负面影响。首先,“高门槛”导致了NGO部门的基本权益丧失。“高门槛”使部分NGO只能放弃部分合法权益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企业法人的形式进行登记并展开活动,甚至导致了NGO在没有任何国家许可下开展非公开和非合法性的活动。其次,由于NGO的独立运营资金的不足导致对政府产生依赖性。伴随着世界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国际NGO进入了中国。虽然该组织在运行模式与运营成本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其涉及的活动领域一般只集中在环保、人权、妇孺权益保护及疾病预控等方面。而行业协会、商会及学术研究团体等大多数的中国本土化的NGO由于种种条件所限只能依赖于政府资助或财政拨款进行运营。这类NGO的核心人事任免权和运营范畴的规划等很多方面在很大程度受政府的影响。而“放”

主要是指当社团组织从事社会急需但政府由于人力或政策的限制无法及时有效地涉入领域时,政府往往会采取鼓励性政策、资金支持和政社合作等方式扶植该组织的业务开展,并促进其规模的壮大。当这类社团组织得到政府的立体式的资助后,不仅可以顺利完成该组织的既定目标,而且还会将重点放在培养个体公民服从大多数公民利益的牺牲精神和全局意识。在此过程中不仅是公民自身而且社团组织的社会价值都会得到更全面的体现。<sup>[8]</sup>

从全局出发社团组织扮演的角色可以被暂定为存在于国家与社会间,类似于促进两者对话的媒介或者中介结构。但该组织在分担部分社会管理职责的过程中不仅起到有效地化解国家与社会间直接矛盾的作用,而且还间接地促进了政府的体制改革,并减少政府运营国家与管理社会的成本支出。所以社团的发展状况既是政府深化体制改革的信号,又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化建设的阶段性“成绩单”。虽然相对而言中国的 NGO 与西方国家相比缺乏相对的自由性,但在特殊的体制下 NGO 在运营与发展过程中却与国家缔结了协作共生关系。

### (三)国家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促使了两者间关系的重新定位。首先,国家将知识分子看做政治改革与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动机”。在中国一般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称之为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持有的创新型科技成果不仅有利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并提高生产力,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的热潮中,知识分子提出的“创新理念”恰恰完全符合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另外,因为知识分子具有先进的理论背景和创新精神,既善于探究新的理论知识,又敢于质疑旧理念并对现有国家体制、政治制度及社会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及整改意见。但仅以此为依据就判定国家与知识分子间存在的是非友善关系是完全片面且错误的。因为从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国家需要的正是这些具有前瞻性并有助于国家进行科学化体制改革的建议,所以两者应是“理论”产出与付诸“实践”的关系。

其次,国家将提高知识分子的综合能力看做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际上超级大国的重要标志已不仅局限于政治外交影响力、经济与军事水平,更注重文化与教育等方面的综合实力。<sup>[9]</sup>为了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中国政府近期提出了“文化兴国”与

“和平崛起”口号。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进一步阐明了国家高度认同知识分子阶层所属的文化教育领域对推动社会发展并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立场,也间接地说明了知识分子将从国家获得更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与优待政策。所以,知识分子在社会活动中实际上充当了国家“智库”角色,并且在两者交流与互助过程中构建了协作共生的关系。

### (四)国家对社会的不同声音的“善治”

在转型期,普通劳动者和农民特别是农民工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当该弱势群体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时候,往往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进行呼吁,以达到引起社会共鸣和政府注意的目的。作为管理者—政府为了更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并缓解社会内部矛盾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对应措施。首先,政府提出了行政改革与法制化建设目标。政府提出的“依法治国”口号,不仅向公民赋予了“民告官”的权力,更营造出了一种公正的社会氛围,重塑了政府良好形象,并极大地缓解了“民官”间的紧张气氛。另外,通过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成功地开启了农村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了因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人与土地间的矛盾。第二,中央政府通过向地方政府进行适当分权和完善各级信访机制的方式完成了逐级解决具有基层性和地域性特点的社会矛盾的目标。第三,政府提出“重视民生、均衡发展”的方案。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政府在取消农业税并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基礎上,重点在中国的东、中、西部等地区实施了具有特色的地域经济发展规划。第四,逐步实施“均富论”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普及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义务及职业技术教育等惠民政策。通过实施“新劳动法”进一步保障并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在面对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的时候,为从本质上解决社会问题主要通过采取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公民的福利待遇及均衡国家发展的方式,将原本国家与社会弱势群体间相对紧张甚至是对立的关系成功地转化为协作共生关系。

政府在转型期应通过对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积极满足公民的多样化需求和官民互动等方式与社会的多个阶层间成功地构建了“和谐”关系。国家与社会间默契关系的形成,不仅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安定团结,而且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效率,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 四、结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上不存在市场的概念,国家的几乎全部的经济活动都是在政府的“计划”与“调配”下完成的。这一特殊期间政府按照地区与职能的特点将社会划分为城市与农村两大管理体系,并分别通过在这两个区域实行“单位”和“人民公社”制度对其进行垄断式且封闭式的管理。也可以狭义地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完全埋在政府高度集权的管理体系中,并基本丧失了社会本身的基本机能。即特殊历史时期与国情促使政府具有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职能,所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公民社会基本没有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传统的国家管理方式日益凸显出局限性和片面性。所以政府在摸索创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充分地认识到了应在准确客观地明确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培养国家与社会间协作与共生关系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而两者间这种“和谐”关系的形成正是全面实现共同治理国家的理想目标的必要条件与基础。本文提及的两者间的“共生”关系不只局限于狭义上共存亡的层面,更应该期待国家与社会的各自能量在正和博弈的规律中共同增强。迈克尔·伯恩哈德认为,民主体制下惟一良好的权力配置就是强国家和强公民社会的共存。<sup>[10]</sup>这里提及的国家能量的增强是特指国家在专属领域内进行合理管理的过程中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得到全面有效地体现。而专属领域是特指在市场与社会都很难发挥其作用的领域。反之,社会力量的增强是指公民社会在完成社会资源与信任资本的高度积累的基础上积极地为公民自愿性参与社会管理活动提供综合性的保障与支持,并在共同治理的过程中使其本身成长为可以抵御国家对社会的过分管制情况的发生,并最终使其成为与国家相对平等且独立的主体。<sup>[11]</sup>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相比具有特殊化、多层化与细分化等特点。仅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利益集团出发就可以将其划分为“受惠群”与“相对非受惠群”两大互相对立的群体。“受惠群”主要由与政府有着密切的经济或政治等方面业务往来的社会精英层组成,因为该群体是社会中最大的受益群体,所以与国家缔结了牢固且持久性的协作共生关系。本文暂称其为“体制内”公民社会。而“相对非受惠群”主要由普通公民和一般劳动者(工人,农民等)组成。在特殊的国情与体制下,该人群处于社会

中的相对不利地位,所以与国家形成了相对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本文暂称其为“体制外”公民社会。但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对国家或政府所持有的态度及立场并非是静态的,它会随着国内外环境、新型政策的导入,市场机制及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微妙或剧烈变化。本文认为社会内部两大利益集团中的“体制内”公民社会在“实力”上拥有绝对优势,而“体制外”公民社会在数量上占我国公民的绝大多数。所以笔者认为,政府应通过合理的政策手段积极地引导并消除两者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只有社会内部的两大利益集团间的关系趋于平稳且合理,才能真正地实现构建“社会”与国家间和谐关系的理想目标。

另外,本文对政府通过何种创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实施来成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目标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应继续大力实施针对性与普及性极强的惠民、富民工程,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内部因利益分配不公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与不满。其次,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信访机制的同时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目的就在于科学合理引导社会弱势群体在受到不公待遇的情况下应选择法律途径来保护自身权益。此举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公民的极端行为与群众性集体事件的出现,而且也可以在提高社会的公平性及监督职能的同时间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最后,政府应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步伐,并为特色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必要的空间和载体。目的是为了在有效地培养其自治能力后,引导其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管理活动中,从根本上扭转当前政府提供的相对有限的公共产品无法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公民需求的被动局面。所以笔者认为,在转型期的关键时刻,政府应大力地推动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科学合理转变,并通过实施创新式的社会管理模式,积极地在两者间构建“和谐”关系,为中国实现社会稳定与平稳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 [参考文献]

- [1] 孙柏瑛.当代地方自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4,51.
- [2] [英]Kooiman. Modern Governance: Government Society Interactions[M]. London: Sage, 1993. 109.
- [3] [英]全球治理委员会.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3.
- [4] 俞可平,等.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 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2. 192—203.
- [5] [韩]李民子. 来自社会底层的反抗与中国特色的公民

- 社会[J]. 中苏研究, 2009, (1): 13—41.
- [6] 李亚杰. 宗旨时刻不能忘记[N]. 人民日报, 2001—07—02(1).
- [7] 新华社. 按照“三个代表”切实做好党务工作[N]. 人民日报, 2003—11—15(1).
- [8] 胡世前. 韩国新村运动评析与启示[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5): 28—38.
- [9] 胡翠月. 关于中国留学政策对赴韩中国留学生规模变化影响的研究[J].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 2012, (1): 321—351.
- [10] 何增科. 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0, (1): 27—32.
- [11] 李慧凤.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1): 67—72.
- [责任编辑: 吴守凤]

##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during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China

HU Shi-qi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citizens' heightened awareness make totalitarianism loose and have strong impacts on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o establish the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 of state and society by structur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will be the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complicated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styled” relationship works on the premise that healthy civil society, which is the core dynamics of social progress, can develop well. However,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determines that China cannot develop in a Western mode. It must lay stress on Chinese features.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will safeguard th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state; society;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 civil society